

“安全监管”才有“食品安全”

■ 张东阳 职员

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幕，会议还举行了联组会议，专题询问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针对常委会委员们提出的关键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回答。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回答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时透露，近些年公安机关打击食品犯罪都采取了非常规的行动。这几年每年破获案件都在2万起左右，是前几年的几倍。(7月3日《重庆商报》)

民以食为天，事关食品安全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小事。尤其是面对着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百姓更是期待多。而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源头性监管问题，中央组建了统一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并由食安委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管中存在的多头管理、分工交叉、职责不清等突出问题，但问题依然不少。

其中之一就是有关食品标准不统一且繁琐的问题，客观上造成了监管难。尽管目前有关部门已对分散在各个部门的5000项

标准进行了清理整合，但由于全国食品和居民的饮食习惯非常复杂、广泛，制订科学有效、统一的标准难度不小，还有待继续加大整合力度。

有关法规的配套还不够完善。自新的《食品安全法》2015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实施条例出台仍有待时日，同时，多部相关配套规章还没有发布。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然而，不管食品安全有什么样的标准和多么严格的法规，执行上的问题仍是决定因素。尽管国家层面2013年就确定了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职能和食安委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职能，但是各地落实起来却步履维艰，因为原先行使食品药品监管一定职能的工商、质监等部门的职能被整合后，这些部门将不再进行垂直管理，将会增加地方的机构数量，而地方又要执行机构减缩等改革要求，因此工商、质监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三合一”改革面临诸多利益纠葛和现实难题。因此，直至现在，全国还有20%的市和60%的县仍没有独立设立食药监机构。

这就意味着，一些地方的工商、质监等行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有时候仍然需要靠“罚款”来挣，他们存在的目的就不是为着“消灭食品安全隐患问题”而存在，而是要“放水养鱼”，让被监管者不断“违法生产经营”，然后他们就可以不断地从这样的违法“罚款”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薪水保障，因此部分监管人员“每天就想着如何创收”……加之交叉管理中存在的监管漏洞，让这些部门监管人员存在侥幸心理和推诿扯皮心理；反正监管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出了食品安全事故，不能仅让一个部门来担责。

如此心态和如此体制性问题，也是监管者不能真正以百姓食品安全为己任进而“狠心”监管的原因，这才使得看似分工明确的监管部门存在监管缺失和放水养鱼等问题，最终造成了食品安全事故屡屡出现。

今年初，中央再次下“狠心”，采取党政同责、标本兼治的办法，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和制度，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然而，当前我们距“四个最严”尚有较大差距，法规上的严格不是真正的严格，真正落到实处的严格，真正严格执法的行为才是真严格，才有真效果。食品安全的标准是前提，但却离不开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处罚和问责，否则，遇到心慈手软或有放水养鱼心理的监管者和利欲熏心的食品生产者，食品不可能“自觉”地“安全”的。要让规章制度和标准真正发挥作用，就要让人们知道，无论是食品标准制订者，还是有关法规执行者，每天也都是要“食用”一定的食品的，即使是食品生产者也不可能只吃自己生产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食品，而这些食品安全与否，不仅会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更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此基础上，加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监督举报力度，让每一个人都发挥监督作用，并加快推进有关法规、标准制订力度和食品药品监督机制改革力度，才有可能迅速起到食品监督的“安全”作用，标准不统一、法规不严格，监管不安全，食品安全就是一句空话。

拿什么消除“宜家们”赤裸裸的歧视

■ 止凡 注册会计师

由于床头柜及橱柜压倒致死6名儿童，宜家家居公司近日宣布，将针对美国及加拿大市场召回包括畅销的马尔姆系列在内的3560万个抽屉柜，但此次宣布召回的区域中并没有包含中国。对此，深圳市消委会已经介入调查，正式向宜家发出调查函，最终目的是要求宜家中国无差别召回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同类问题抽屉柜。(7月2日新华网)

如果说，在“夺命抽屉柜”事件之后的召回行动，代表着宜家对品牌信誉的呵护以及对消费者利益的负责；那么，将热销同类产品的中国市场排除在召回范围之外，则代表着宜家对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消费者赤裸裸的歧视。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消委会的及时行动，为国内消费者切身利益发声，值得大家点赞。

质量上的双重标准，价格上的无理虚高，召回上的区别对待，凡此种种，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从日用品到奢侈品，从洋奶粉到洋电子，从食品领域到汽车领域，憋屈的中国消费者，一直承受着“价高质次”的双重标准。所谓“全球召回”，屡屡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宜家此番再度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召回范围之外，无非是“有样学样”而已。

这样的傲慢与偏见，这样的歧视与伤害，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是毫不掩饰的。他们好像丝毫不惧于中国消费者的愤怒。所谓符合中国“柜类稳定性标准”，当然是可鄙的表面借口；真正的原因，只能是基于利益的考量。换言之，歧视的代价微乎其微，既不会有损销量，也不会收到歧视罚单。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薛兆丰先生曾为歧视正名，在他看来，那些貌似没有道理的歧视，深究下去，总能找到其中微妙的原因和道理。价格歧视也好，召回歧视也罢，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去解读，本质其实就是“区别对待”。为什么要“区别对待”，肯定是因为有利可图。在商言商，极少无缘无故的歧视，或者不合算的歧视。换句话说，中国消费者之所以被歧视，在“宜家们”眼里肯定是有合算的，需要为歧视支付的代价，远低于因为歧视而获得的收益。

不得不说，这里面，肯定有消费者的因素。因为企业歧视的标准，往往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敏感程度来确定的。如果我们给人留下的，就是那种“人傻钱多”的印象，人家怎么歧视你，你永远都是“买买买”，不歧视你又歧视谁呢？价格自然比别处高，质量自然比别处差，召回自然不包括你。

反过来，只有我们的消费心态更加成熟，不再迷信洋品牌，不再迷恋炫耀消费，对于商家的双重标准，知道生气并且敢于维权，人家才会真正尊重你。试想，如果宜家不在中国召回问题产品，消费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立马人流锐减销量大跌，甚至遭遇消费者集体诉讼，还敢这么赤裸裸地歧视吗？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监管者的积极履职。强大而负责的监管，敏感而积极的行动，往往是歧视者最为忌惮的因素，因为他们知道将要付出很高的歧视成本，所以不得不自动修改自己的“歧视标准”，将某些监管严格的地方列为“歧视禁区”。这个意义上，“宜家们”的歧视行为，歧视的不仅是消费者，还有我们的监管部门。

丰田质量门也好，大众排放门也好，美国消费者最后得到的赔偿处理几乎总是最好的，为什么？监管者有力，消费者得利。我们在为深圳消委会点赞的同时，也期待更多职能部门，能够成为让“宜家们”不敢再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关键力量和坚强后盾。

“国企高管市场化选聘”步子不妨再大一些

■ 张国栋 职员

限制薪酬的同时，扩大市场化选聘将成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记者日前获悉，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酝酿政策，通过扩大试点的方式，逐步增加国企高管的市场化选聘比例。(6月30日《经济参考报》)

可以确定的是，《关于开展市场化选聘和管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试点工作的意见》已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下一步，国资委将在文件的基础上，再选择3至5家开展试点，力争通过3到5年，绝大部分国企都按照职业经理人制度选聘负责人，用市场化的考核机制来制定相应的薪酬。这意味着央企、国企的“一把手”或更多地从市场中产生，同时国企高管薪酬将与其选聘方式挂钩，真正实现通过薪酬激励留住人才，并为企业发展增添活力。

不过，在笔者来看，既然国有企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要让他们有航天发动机的动力，就是要给职业经理人创造环境，减少政府对国企政治上的压力，让国企专注于经济职能，减少



附加的政治职能，把和政府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使国企全身心地面对市场竞争，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相关的顶层设计已完成，那么，上述“3至5家”是否太少？“3到5年”是否太长？

笔者以为，答案恐怕是“是”。毫无疑问，选人和薪酬制度应该是国企市场化改革尝试的重点和关键，也是各方面的期待。虽然其中有问题有难度甚至有阻力，但这并非今日才有，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能老是瞻前顾后，搞试点或“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早在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

挥企业家作用。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可是3年多过去了，这方面的举动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步子并不大，效果不明显，与各方面的预期尚有距离。

不难理解，改革不能等，也不能老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到国企高管实行市场化选聘，我看“3至5家”太少，“3到5年”太长，改革步子完全可以迈得再大一些，也应该再大一些。只有尽早让国企履行经济职能，减少附加的政治职能，把和政府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使国企全身心地面对市场竞争去竞争。只有当越来越多地来自市场一线的精英们执掌国企，服务国企，国有企业这艘巨轮必然能在全球市场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不断阔步前行。

同时，国企高管市场化选聘，现代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高度透明化的“选用人机制”，也将缓解社会舆论有关国企薪酬的争论，利于克服国有企业在考核、激励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僵化，特别是因缺乏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制度和市场化薪酬制度，造成了很多企业出现高端人才流失，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并非跷跷板游戏

■ 舒圣祥 媒体评论员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我国将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要求，全面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遵循医院收入不降，公众总体负担不增，医保基金可承受的原则，力争到2020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初步建立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多方参与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7月6日新华网)

这一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将原来的三个补偿渠道变成两个，也就是让医院在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之外，不再通过药品加成收入维持运营。二是使医疗服务价格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提高偏低的诊疗、护理、手术等价格。说白了，这也是一场医院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降下去，把诊疗收入和服务收入提上来。

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跷跷板游戏：医院不再收药品加成费了，少了40%的总收

入，但是医保不额外拿出钱，财政也不额外补贴，而是“给政策”，让医院在诊疗费上涨价，药品减少的收入靠诊疗费补回来。对此，最常见的质疑是：患者并没少出一分钱啊，如果诊疗费的比医药费降的多，那还得多出钱呢，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吗？除了政绩，不是啥也没变吗？

说实话，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迷惑人，前些年我也曾这样想过，但这是不对的。可能我们传统的中医，主要收入就是卖药，所以觉得医院就是卖药的；其实，医院既不是卖药的，也不是“出租”医疗设备的，医院真正出售的是专业知识和技术。挂号费、手术费、护理费，这些都是医院的主业，但主业并不能换来主要收入，于是依赖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等问题严重。

或许有人会说，医院应该靠什么赚钱，跟患者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都是掏钱，是拿来挂号还是拿来买药，不都一样吗？不对。别忘了，价格永远是市场交易的核心，它的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首先，作为供给方，废除药品加成，提高诊疗费用，会引导医生的行为，使其不再通过开大处方、大检查来获取收入，医生不再是越黑心

越挣钱，而是越有本事越挣钱，像小儿科医生流失等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再有，诊疗技术更值钱以后，人才的价值和服务的价值必然凸显，这会有助于医院内部的良性竞争。现在，医院之所以会有穷科室富科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的科室开的检查多卖的药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含量高服务水平高，这对患者而言显然是不利的。

还有，作为需求方，患者的就医行为同样会改变。现在之所以很多人看病往大医院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医院的专家号也不过那点钱，只为求个心安，药倒是不可以不买或者去外面买。改革以后，就医价格层次更分明，小毛病去社区医院显然更划算，这也会引导人们的就医行为，从而改善大医院人满为患以及“大专家都在看常见病”的现状。

至于患者总的就医费用，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之前很多大检查、大处方本身是不必要的，有的药物甚至完全可以小包装分开卖。如果以药养医机制真能破除，患者就医费用至少不会大幅提高。

企业社会责任不止于真金白银

■ 邓海建 媒体人

7月12日，当下火爆的企业级社交软件阿里巴巴钉钉将开启全国巡回之旅，并将DING峰会首站设在了成都。此前，网商银行宣布，将为此次大会带来一份特别的贺礼：面向四川的小微企业开出1亿元专属贷款额度。四川当地的钉钉深度认证企业将首批享受到网商银行的特定扶持贷款。(7月7日《成都商报》)

阿里钉钉向西部中小企业抛去橄榄枝，这是业务战略，亦是社会责任。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慈善晚宴上拍卖的价码，或者仅仅是大灾大难中的真金白银——更重要的，它已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成为渗透进企业发展策略的行为准则。从企业经营管理者，到组织层级架构，责任即利润、责任即远景，业已成为基本共识。

如果将阿里巴巴视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样本，基本能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在

中国的发展路径。早在2006年，新颁布实施的公司法，首次明确规定企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至此，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道德血液”，法律亦有了标志性规定，2006年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十年过去，舆论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有了更多元的考量。就像美国学者詹姆士·穆尔在《竞争的衰亡》中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立体而丰盈的生态概念。

一是企业领导者身先士卒，须扮演好“小而美”的慈善角色。7月4日，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个人发起并捐赠成立的马云公益基金会，发布“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预计10年投入约两亿元，寻找、支持中国优秀乡村校长。这是马云继“乡村教师”计划之后又一次在乡村教育事业领域的公益行为。几年前，马云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头衔“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会董事”，至今微博认证用的都是这个头衔。从“浙江

马云公益基金会”到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虽有争议，却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二是企业经营决策须有主动的责任意识。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6000的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这些行为包括贡献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利；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相一致等。简言之，赚钱与提供就业岗位是社会责任，打假与反垄断亦是社会责任，善待员工与融入社会亦是社会责任……在2016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宣布联合32家中国及全球合作伙伴启动菜鸟绿色联盟：到2020年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为100%可降解绿色包材。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结合返乡创业试点发展农村电商战略合作协议。凡此种种，从自身商业模式出发，并以

此为支点，将商业与事业、利润与利益、生态与生活结合起来，有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架构，在企业决策与发展战略中前置社会责任维度，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表达范式——而不是从客观后果中去攀龙附凤地主观演绎。

企业社会责任如同政府透明度指数，听起来玄乎，总有迹可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5)》显示，在被评价的电力、特种设备制造业、石油石化行业、银行业等16个行业中，互联网行业以38.8的发展指数位居第六。这起码说明，即便在“互联网+”语境下，也不是说沾了BAT的光，就天然成了社会责任里的“头牌”。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路上领跑着中国企业的大道与大势，并非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总之，从真金白银开始，走向社会责任的辽阔天地，中国企业依然任重而道远。